

东方编译所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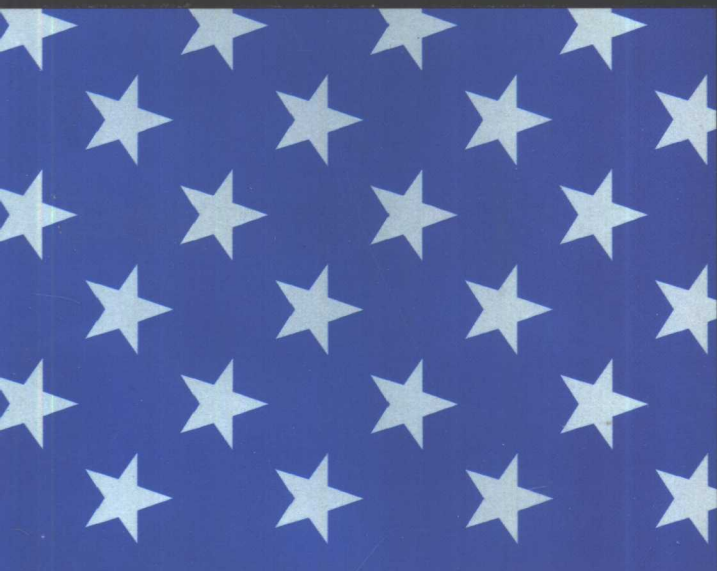
DONGFANGBIANYISUOYICONG

[美] 艾什顿·卡特 著
威廉姆·佩里

预防性防御：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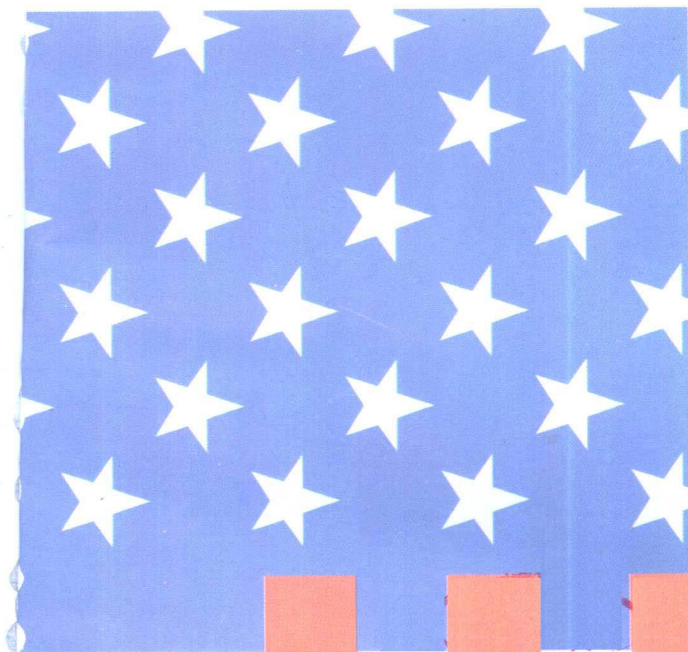
USA

[美] 艾什顿·卡特 著
威廉姆·佩里

预防性防御：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
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US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美)卡特,(美)佩里著;胡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书名原文: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ISBN 7-208-03368-4

I. 预... II. ①卡... ②佩... ③胡... ④杨... III. 军事战略-研究-美国
IV. 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20 号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Copyright ©199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S.A.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甘晓培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美] 艾什顿·卡特 著
威廉姆·佩里
胡利平 译
杨韵琴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13 字数 164,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3368-4/D·596

定价 14.00 元

序 言

美国战略学家佩里博士和卡特博士的著作《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文版。我与两位作者有过多次会晤，对他们的智慧和坦率及对问题的研究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尽管有不同的立场，但两位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很多看法和论点，是值得中国读者重视的。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在近二十年里始终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尤其在新旧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其中，军事安全是比较敏感和重要的一个领域，它涉及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安全，这本书谈到的台湾问题就是典型事例。未来要想维系一个良好稳定和互利发展的中美关系，将比过去的二十年更加重要，不光对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而且将对我们的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产生很大影响。我国对台湾的政策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并且将比香港和澳门的政策更加宽松。我们希望美国朋友了解中国的对台政策，是从世界大局、中美关系、中国统一，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出发的。我们需要“求同存异”，努力减少各种磨擦与麻烦。同时，也需要发挥学术思想界及各种渠道的作用，力争研究和开发更多的创造性智慧与建议，从这个角度讲，了解两位著名美国战略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华关系方面的意见，从而加强我方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思考，是有意义的。我们要

FSOE/cj

妥善处理包括对美关系在内的整个对外关系,使中国在新世纪里继续沿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他所倡导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世界和平共处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前进。这必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新千年在即,谨此寄语。

汪道涵

1999年12月30日

导 读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很特殊的作者写的一本很特殊的书,一部篇幅不大、分量却相当重的国际政治和战略学作品。

这里讲的“特殊”,第一层含义是说两位作者有非同寻常的身份。A.卡特博士,物理学家出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军控事务和“预防性预防”的高级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前些年曾任助理国防部长(主管冷战后的俄罗斯裁军事务)、白宫负责朝鲜半岛事务总协调人的高级顾问等要职。W.佩里博士,数学家出身,做过投资银行家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主持过许多重要的军事发展和军备控制项目,曾任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一段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现为美国政府涉朝事务总协调人。

特殊性的第二层意思是,两位作者在任职期间与中国交往甚多,尤其与我军方有过各种各样的广泛接触,十分了解我们的想法和实力(包括弱点)。尤其是佩里先生,他不仅在1980年率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我国,而且,在90年代中期由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正是佩里先生直接下令派遣两艘航空母舰的编队到台海两岸对峙的附近海面“游弋”。近两三年中,已不担任国防部长但仍兼其他“敏感职务”的佩里先生曾多次来华,不仅与我军所有最高层领导人有过会晤,也同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进行过多次所谓“第二轨”的对话。在我的印象里,与某些美国人惯有的狂妄自大做法

不同,至少看上去佩里先生显得儒雅和长于沟通。特别要指出的是,佩里先生在《预防性防御》里专辟一章,讲他任上发生的台海危机和美方“应对”,以及近期他和卡特博士同中国有关方面交往的感受。了解一下佩里部长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包括他对我方做法及决心的评估,是有必要的。

最特殊之处也许在于,虽然两位作者现在均已不担任国防部的具体职务,却仍以“高级专家”或“特别顾问”的半官方半民间身份,直接被美最高决策层委以有关东亚事务的重任。他们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近年来主笔写成或参与起草的某些基本战略概念(如作为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预防性防御”范畴)和某些纲领性文件(如“北约—俄罗斯关系”的基础文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的原则、美国未来对朝关系的设想)。对关心国际战略问题的中国读者而言,上述情形自然使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例如两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内森教授和罗斯教授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也多少有别于美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大外交》或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因为后者属于已卸任的政府要员的个人观点。我相信,这本薄薄的书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权威性”与“当下性”,是它将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以《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命名的这本书,用两位作者的话说,讲的是在苏联解体、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必须面对的有别于以往的若干“全球性危险”或“重大安全威胁”,和为防备这些“威胁”而制定的“21世纪美国国家防御战略”。在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四十余年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十分明确,即“遏制苏联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扩张”。到90年代初,美国人相信,这种危险已经消除,至少很难

感受到来自同一方向的“迫在眉睫、清晰无误的威胁”。然而,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与磨合,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麻烦。作者把冷战后时期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或“主要危险”,按严重性和范围大小分成三等。较小的威胁是在某些偏远地方(如索马里、卢旺达和海地)发生的战乱,其次是重大的地区性威胁(如“伊拉克对波斯湾的威胁或朝鲜对韩国的威胁”)。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头等威胁有五个,它们是:俄罗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的道路;“俄罗斯及其他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有可能丧失对前苏联核武器的控制”;“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中以合作的精神发挥作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可能扩散,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美国境内有可能发生其规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

针对上述所谓“新威胁”,佩里和卡特提出:“制定和推行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是当今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军方领导人的首要使命。”他们强调,美国不但要以实力为后盾,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确保美国安全的最终手段,而且应当建立和实施不同于传统威慑战略的预防性防御战略,在一个不太稳定且不那么确定的世界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这项新战略中,五角大楼仍起着关键作用,但预防性防御同时又“是一项内容广泛的政治军事战略,包含了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比如,它可以设立美国国会的专门拨款,甚至动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提供各种好处(如资助兴建军人住宅、增加民用技术和经济贸易往来等等),促使这些国家销毁那些易使美国人致命、同时“可能看管不严”的武器或技术;它可以通过与潜在对手国的军方和其他上层精英的多种交往,影响这些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它可以通过各式各

样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广泛“接触”、核查和遏制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某些“敏感设施”（如核反应堆或可能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它可以建立对付各种新型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在传统军事力量无法顾及的领域制约和消除来自“无赖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挑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是敦促美国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在“预防”二字上下够功夫。

预防性防御战略虽然是一项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安全战略，但我们一望便知它是地道的“美国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已“雄居世界之巅”，美国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其“安全边界”大大扩展，从相对安全向绝对安全转化，传统的威慑战略已不再适用，亟需一项新的安全战略取而代之。预防性防御战略虽然重在“预防”，看似防御性质，实际上却张力十足。美国实施这项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运用各种综合手段消除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包括来自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形成的威胁，地区性冲突的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这项战略在要求最大限度地消弱其他有关国家军事力量的同时，却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军备实力，以作为最终确保安全的手段，其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痕迹非常明显，恐怕很难为有关国家所接受。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两位作者对中美关系前景的预测。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它当然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决策者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作者同时指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假使美中彼此视对方为敌人，潜在的合作因素就会受到压抑，潜在的敌对因素势必上扬，恶意和磨擦的循环最终将导致大的对抗，“双方都会为由此产生的结果而后悔”；如果双方采取理智态度，

各自“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准绳,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就必然会多于分歧”,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各种磨擦就不会蔓延成大的“火灾”。针对中国读者的关注,两位作者在中文版前言里,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作了谨慎乐观的预测:“(美中全面对抗的)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一些客观因素应当能够使美中两国的政策更加接近。美中两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同多于异。我们在亚洲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都离不开亚洲的稳定。同样,面对下一个世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派别冲突等全球性的威胁,我们两国都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这两位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在书中提醒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的崛起,“需要制定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美国现在有机会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它在 21 世纪的国际制度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中美关系今后走向何方等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警告说:“‘遏制’中国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这样一项战略恰恰会把中国推向美国的反面,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都不可能为推行这一冒险的战略付出重大努力并承担昂贵的费用。”在我看来,这两位细致严谨、以分析见长的专家的观点,属于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相对温和的主张,与时下众多的强硬反华喧嚣是有区别的。冷静想一想,不管其中有多少我们无法苟同的地方(包括某些曲解、谬误和威胁),但避免出现大的较量的论点,对于发展总体水平仍旧低下、急需有利环境改造和发展自身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应当而且可以赞成的。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美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国之间的矛盾乃至磨擦肯定会越来越多。对此要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切忌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决策者和有关部门来说,

关键的一点，是如何使那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与磨擦保持在某种可控的状态，防止它们在某种惯性的推助下，逾越危险的“警戒线”，即在军事上“摊牌”直至发生不可收拾的冲突。在此意义上讲，外交、军事和国际战略属于需要统筹兼顾的“复杂艺术”，对它们的不同设计和运作，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别。

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的战略家和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应该读读这本书，并且思索一下这本书所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

王逸舟

99岁末于北京寓所

中文版前言

欣见《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一书的中文版问世，从而我们的中国同行也可以读到这本当初主要是为美国专门研究安全问题的人写的书。正如本书中清楚阐述的那样，我们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指导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书中指出，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和世界大国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中国的安全政策如何演变，美国面对中国日益增大的作用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整个地区——从日本、韩国到印度，还有中亚和东南亚——如何对中国的崛起作出调整，将对国际安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想说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处理安全事务时把对方视为敌人而不是伙伴，双方都会为由此产生的结果后悔。两国彼此为敌的结果必然会成为敌人。然而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一些客观因素应当能够使美中两国的政策更加接近。美中两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同多于异。我们在亚洲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都离不开亚洲的稳定。同样，面对下一个世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派别冲突等全球性的威胁，我们两国都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有些中国同行曾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在书里把中国列为未来美国安全面临的甲类挑战？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命中注定要

成为它的敌人？”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非也。中国和美国没有注定走向冲突。恰恰相反，如果美国和中国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准，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就必然会多于分歧。最终走哪一条路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我们在本书中提出走一条基于两国共同利益之上的路，即奉行接触政策，如果美中选择另一条道路，彼此为敌，两国必然会成为敌人。制定基于理智而不是恐惧的政策需要双方的智慧。

其他中国读者会问：“预防性防御是否意味着美国想阻止中国的崛起？”我们的回答还是：非也。中国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退回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会崛起，而在于怎样崛起。中国会怎么想，怎么做？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对它的崛起又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中国和美国才握有以上问题的答案。各方采取的明智政策既可以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又可以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

换言之，预防性防御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美国的政策，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我们希望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为自己找到一份路标图，也能了解到美国同行的路标图。本书的作者一位是数学家(佩里)，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卡特)。受各自专业的影响，我们认为客观因素最重要。如果未来客观因素在国际安全政策中占上风，各方奉行预防性防御政策就可以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安全上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我俩仍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预防性防御项目下研究美中关系。我们要特别感谢汪道涵先生显示出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他是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率领中方代表团参加美中两国安全问题理论家在“第二轨”举行的一系列形式独特的深入讨论的团长。同时，还要感谢陈知涯博士领导

的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与预防性防御项目展开的合作。

对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出版此书的英文版时给予的协助,以及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文版,我们深表感谢。对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德博拉·戈登女士、巴特利特女士和塞莱斯特·约翰逊女士向我们提供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艾什顿·卡特

剑桥

威廉姆·佩里

加利福尼亚

1999年10月

英文版前言

本书所述观点的产生得益于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间我们在国防部任职时的经历,也是我们离开政府一年后思考的结果。在书中我们回忆了为启动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作出的努力,同时又对未来的美国防御政策作出了分析并提出建议。这种结构也许不那么常见,但对我们来说却很合适。因为预防性防御战略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仍在为此而努力。

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仅几天,我俩到国防部任职。佩里开始任国防部副部长,一年后改任国防部长。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然而本书中的观点和信念早在我们加入政府之前很久就形成了。书中讲述的国家安全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仍在思考这些问题并寻求答案。佩里担任美国第19任国防部长之前,曾在冷战高峰期间任五角大楼主管技术的官员。他本来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选择写一部纯系回忆录性质的书。而我们最终写的这本书却重在分析,着眼于未来,以史为鉴,对今后有可能奏效的国家安全政策提出建议,阐明具体的实施办法。本书对克林顿第一任期间的许多新闻热点问题略去不提,而对根本未上头条新闻的一些问题却详加叙述。叙述的重点是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以及具有持久价值的各种战略,而不是头条新闻报道的危机。辨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中孰重孰轻可以说是预防性防御的依据之一。

1993年3月至1994年2月,佩里任国防部副部长。1994年

2月,他接替阿斯平任国防部长,直至1997年1月卸任。10多年前,佩里曾在卡特政府内任负责技术开发和武器采购的国防部副部长。卸任后,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斯坦福大学任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简称国安军控中心,现改为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副主任。艾什顿·卡特当时任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关系中心主任。我们于是开始共同研究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1993年,卡特任主管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制定本书中涉及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扩散、核战略与军备控制,前苏联与北约关系等方面的政策。我俩离开政府后,均重返大学执教。1996年9月,卡特回到哈佛大学。次年2月,佩里加入斯坦福大学。我俩于是再次合作,启动了两校关于预防性防御课题的联合研究项目。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因此长达10年之久,本书既是这一合作的成果,也是佩里此前在卡特政府任职时工作的成果。

我们深深感谢1993年至1997年期间在五角大楼工作过的各位同僚。这批人称自己为“佩里班子”。同时还要感谢克林顿总统邀请我们在他的政府内任职。

我们在构思和写作本书期间,承蒙纽约卡内基公司尤其是戴维·汉堡和戴维·斯皮蒂以及约翰·麦克阿瑟—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尤其是阿黛尔·西蒙斯和维克·拉比诺维奇的慷慨协助和信任。协助我们的还有丹尼尔·凯斯,比尔·爱德华,汤姆·福特,弗兰克林·约翰逊,金郑和埃利奥特·利文撒尔。赞助单位包括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

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的预防性防御合作研究项目靠了以上基金会、私营公司和私人的赞助才得以开展,这两所大学也是我俩执教的地方。在预防性防御项目下,我们得以对预防性防御战略的各个方面展开了研究。本书即是这一研究的成果之

一。沙利卡什维利和舍伍德·兰德尔也参加了预防性防御项目头一年的研究工作。在此,谨对他们的友好相助致以感谢。

下列人士也为本书中的观点作出了贡献:迈克·阿布拉绍夫司令,奇普·布莱克,罗伯特·布莱克维尔,梅尔巴·博林,库尔特·坎贝尔,卡罗尔·查芬,沃伦·克里斯托弗,詹姆斯·柯林斯大使,约翰·多伊奇,唐娜·迪托托,罗伯特·赫尔曼,劳拉·霍尔盖特,兰迪·豪斯中将,保罗·卡明斯基,保罗·克恩中将,迈克·兰普顿,弗兰克林·米勒,史蒂文·米勒,凯瑟琳·穆尼,乔·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米奇·沃勒斯坦,约翰·怀特,菲利普·泽利科以及多位仍在职的政府官员。

德博拉·戈登和希莱莉·德里斯克尔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和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关系中心预防性防御项目的台柱子。没有她俩的协助,什么也办不成,更不会有这本书。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关系中心的塞莱斯特·约翰逊认真审阅了本书的每一章并提出了自己意见,令我们感到她出色的战略眼光和研究水平。本书编辑特里萨·劳森也对本书的结构和内容作出了远远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贡献。哈佛大学的格雷琴·巴特利特和斯坦福大学的莱妮·狄龙精心整理本书稿子,并使我们的工作有条不紊。

预防性防御战略的性质决定了美国的防御政策制定人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安全首脑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他国家的许多国防同僚继续为预防性防御战略作出自己的贡献。本书中提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此谨对他们深表感谢。